

佛弟子必爱国论



佛 日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和许多民族的光荣传统。爱国，历来被认为是做人应守的本分。当今振兴华夏，建设两个文明，尤需炽烈的爱国心作精神能源。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佛教，实以爱国主义为重要教义，具有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

为佛弟子 必报国恩

从根本上讲，佛法，是超越国界、民族、世间的，世间的民族、国家等界畛，在佛家以尽法界为怀的广大心海中，是不足执着的人为鸿沟。正因为如此，当佛家走入世间面向人类施設教化时，才十分珍重它立足之地的国土和人民。欲“尽庄严一切世界”（《华严经》），何况生我育我的祖国！欲利乐尽法界一切有情，何况供我养我的祖国人民！已离一切分别心的佛陀，生前便曾作过热爱祖国的示范：拘萨罗国琉璃王（Virudhaka）兴师侵犯释迦牟尼佛故国迦毗罗卫，释迦佛虽以神通明见释迦族宿业难移，应被琉璃王诛灭，但还是力图挽救。他老人家故意在琉璃王将经过的路边的一株枯树下打坐，琉璃王遥见是佛，下车礼问：“好树多的是，世尊您为何要坐在这株枯树下？”佛答言：“亲族之荫，胜于外人！”琉璃王被感动，引兵归国。后来琉璃王受恶人挑唆，再度率兵攻克迦毗罗卫，诛杀佛之亲族，佛因此头痛“如被石压”，亲率众比丘去看望

被琉璃王砍断手足的五百名释迦族烈女，说法抚慰，使她们得离创痛，皆生天上。（见《长阿含经》等）佛爱国爱民的一片至情，于此可见。

佛多次教诲弟子：须将知恩报恩作为必须尽的义务，作为大乘菩萨道的重要内容。须报之恩，一般说为四种，有父母恩、众生恩、国王恩、三宝恩四恩及天下恩、国王恩、师尊恩、父母恩四恩等说法。《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卷二“报恩品”云：

“世间之恩，有其四种：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王恩，四三宝恩。如是四恩，一切众生平等荷负。”

将国王恩置于三宝恩之前，可见其重视程度。该经中强调：“国王恩者，福德最胜。”为什么？因为国王肩负教化人民、治理天下的重任，对人民的安乐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能使人民避免他国侵逼、自界叛逆、饥馑、疾疫、灾荒等恐怖。经中譬喻说：

“譬如世间一切堂殿，柱为根本，人民丰乐，王为根本，依王有故；亦如梵王能生万物，圣王能生治国之法，利众生故；如日天子能照世间，圣王亦能观察天下人安乐故。王失正治，人无所依。”

人若离了国家，便如浪子无家可归，凄惶孤苦，无所依怙。一个国家中所有的人民，都

沐浴在国王的德晖中,其所有的事业成就,都有国王的一份功劳。如经所言:“若王国内一人修善,其所作福皆为七分,造善之人得其五分,于彼国王常获二分。”既然有大恩于我,作为人民的佛弟子,理应知恩报恩,报效国家,尽忠尽职。

佛当时说法,针对的是古代社会的听众,按当时社会制度,国王乃国家之代表,故教人报国王恩。在教诫人民报国王恩的同时,佛谆谆教诲国王:须以正法治国,加强自身修养,爱民如子,率导人民奉行十善,依法惩治恶人,使国土安宁,人民丰乐。在《金光明经》、《孝经》、《出爱王经》、《大萨遮尼乾子经》等经中,佛对王法政道有很详悉的开示。

在现代社会,佛说的报国王恩,自不宜限于国家元首,而应理解为现代爱国主义意义上的国家、祖国。这一意义上的国家、祖国,包括祖国的山河大地、人民、国家领导人、光荣历史、民族文化、优良传统,乃至祖国大地上的佛教名胜寺塔、法物、僧宝等,实际包括了《心地观经》等所说四恩的全部。

显而易见,一个人自来到这个世界起,便一天也离不开国泽民恩,其生存,是自己身心与国泽民恩因缘合集的过程。一个佛教徒,即使出家入山独自修行,也离不开国泽民恩的外缘:离不开国家领导经营筹划所造成的社会安定,离不开军人守卫国界、警察维护治安所带来的安全感,离不开农民种田供给食物、工人劳作提供衣服用具,离不开教师辛勤培育灌输文化知识,……乃至离不开整个国家、全体人民。

佛法从缘起及因果的角度,强调报答国恩的必要性。依缘起、因果之理,报恩,乃顺应因果律之智慧者所行,报恩必得福报,若不报恩,必得恶报。《心地观经·报恩品》云:“世间凡夫无慧眼,迷于恩处失妙果。”龙树菩萨《中观宝鬘论》云:“忘恩起贪着,后难获义利。”人若不报效国家,便如同不孝父母,从人性来讲是昧天良,从因果来讲是负了业债。现在有些青年人,从小受国家教育,靠国家供给出国留学,因贪恋国外生活条件之优裕,学成而不归国报答祖邦,甘愿做外国的二等公民。从佛

法看,这种人便欠了国家的债。至于那种出卖国家利益者,从佛法看来更是极大恶人。

对于修学大乘菩萨道者来讲,佛法报答四恩的要求就更高了,大乘要求菩萨行者无条件地以全部身心报答四恩,永无止息,将此报恩心贯彻于六度四摄的始终,视一切众生皆为自己的大恩人,精诚报效,如日“普照一切,不求反报。”(《华严经·十回向品》)报答国恩,当然包含在内。

遵循佛祖教诫,佛教历来重视报答国恩,佛教徒中,出过不少爱国名人。从舍身求法、扬国威于域外的法显、玄奘、义净,禁烟抗英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为维新变法从容就义的谭嗣同,到近现代投身革命的宗仰和尚、抗日战争中的僧伽救护队及奔走南洋鼓动抗日救国的太虚,“念佛不忘救国”的弘一,佛弟子赤心爱国者不计其数,爱国爱民蔚成风气。即便是一般出家的僧尼,每日朝暮课诵,都要祈祷回向,祝愿“三途八难俱离苦,四恩三有尽沾恩,国界安宁兵革消,风调雨顺民安乐。”寺院经像,实际上是弘扬传统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夏莲居居士说得好:“真佛徒必能勤俭爱国,……真佛徒必能拥护社会主义,真佛徒必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净语序》)此言大有深意。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以来,高扬“爱国爱教”的旗帜,号召佛教徒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谱写下了佛教徒爱国报国的一页页新篇章。

国兴则教兴 国衰则教衰

从佛法“依正不二”的眼光看,佛教的命运与国运紧密联结,国兴则教兴,国衰则教衰。而国家命运,又是全国人民命运的根本。四十《华严》卷十二有偈云:

“人以王为命,王以法为身,

世道既和平,佛法由兹始。”

指示佛法、国家、人民三者互相依赖的关系,十分精赅。国家(王)为全体人民生命之本,国家(王)以正法为强盛安定之本,以正法治世,才能保障和平安定,有了和平安定的政治环境和国家政策法规的保护,有了和平安定环境下生活丰乐、文化较高、精神需要丰富

的人民,佛法才有传播弘扬的基础和条件。如四十《华严》所说:

“国有君王,一切获安,是故人王为一切众生安乐之本。在家出家,精心道检,皆依王国而得住持、演化流布。若无王力,功行不成,法灭无余,况能利济!是故所修一切功德,六分之一,常属国王。”

如果国家不安定,人民衣食难保,居不遑安,何暇顾及佛法?尤其是国家若不保护佛教,佛教只有衰落灭绝,哪里谈得上弘扬鼎盛。当然,一个不保护人民信仰自由、不依起码的正法(扬善抑恶等)治世的国家,也不可能富强安定。这有数千年史实作证:公元八九世纪以后,印度佛教衰颓,回教军不断侵伐,其所至焚寺屠僧,强迫人民改信回教,随佛教之灭绝,印度国势亦从此一蹶不振,再未出现佛教时代的强国盛世。中国历史上,多次兵革战乱中,佛教都备受摧残破坏。尤鸦片战争以来,国运日衰,佛教亦随之不昌。“文革”横扫四旧,佛教失去政策法规之保护,遭受空前浩劫,全国人民亦饱经劫难,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佛教逐渐复苏,国家经济文化亦日见繁荣。这其中的因缘,值得人们研讨参究。

振兴华夏 佛子有责

振兴华夏,促进经济文化腾飞,将祖国建设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现代化强国,是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乃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国公民一分子的中国佛教徒,当然责无旁贷,肩负着振邦兴国、建设两个文明的重任。振兴华夏,对佛教徒来讲,不仅事关自家切身利益,关系全民利益,关系佛教之振兴,而且是菩萨道所必行。大乘菩萨道以“庄严国土”、“净佛国土”、“利乐众生”为菩萨事业,为成佛必行之道。《摩诃般若经》卷二六云:

“菩萨摩訶萨不净佛国土,不成就众生,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若连自己的国家都建设不好,不能令其居于世界强国之前列,不能使自己国家的人民丰乐自在,还谈什么净佛国土、成佛度众

生!古人常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曾鼓舞多少中华儿女赤诚报国、为国献身。今天,对佛教徒来说,当以“振兴华夏,佛子有责”为口号,积极投入国家建设,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在建设两个文明的事业中勤修六度四摄,奉献才智力量,以辉煌业绩、实际行动,表现出佛教庄严国土、利乐众生的宗旨。考虑问题、弘扬教法,不能仅从佛教教团的本位利益出发,从个人之了生死出发,从自己的庙子出发,应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从精神文明的建设出发,争取发挥佛教的力量、佛法的智慧,为振兴华夏,尤其是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和精神境界,作出应有的贡献。寺庙僧人,虽不一定要奉献物质财富于国家社会,也要以教化在家佛教徒积极参加国家建设为己任。人民道德水平低下,社会弊病得不到解决,国家建设发展缓慢,不应只归咎于政府或天意,而应引咎于公民自身,引咎于佛教徒未能尽到应尽的责任。若能教化国民,人人都树立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则华夏腾飞,指日可待。

欲兴邦国 须兴佛教

建设祖国,振兴佛教,对佛教徒来说,不仅应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精勤奉献,而且须致力于佛教自身的建设,力图振兴。振兴佛教与振兴华夏,有着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一回事。因为佛教在人间,首先是一种社会教化体系,向人们提供安身立命之本,提供做人处世最根本的人生观、伦理观、价值观,担负着导世化众、教育国民的职责,对文明的建设、国家的振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佛教在中国流传近两千年,长期为中国精神文化三大支柱之一,起过化导民众的巨大作用。在当今社会的各种文化体系中,佛教仍具传统优势,在社会上有崇高威望,在广大民众意识、潜意识中有深刻影响。佛教具有堪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圆满教义,思想内涵精深博大,能净化人心、启迪智慧,针治社会弊病,拨正文明走向。佛教以“法”为中心的智慧信仰,能给科学时代重理性、重实证的人们提供可靠的安身立命之本;佛教重智慧、重福德、重利乐众生的价值观,能提供正确的人生司南;佛教“诸

法无我”的思想,可以警诫人们省察个人主义的危害;佛教大慈大悲、普渡众生的精神,提供了高尚的道德准则;佛教五戒十善等行为规范及善恶业报之说,可以有效地遏制凶杀、偷盗、淫乱、诈骗等恶行;佛教依正不二、自他不二的宗旨,可以启发人们重视环境保护、社会公德,调节好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佛教报答四恩、布施奉献之旨,可以动员人们为国家社会忘我贡献,投入社会福利救济活动。

当前,中国正值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上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紊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泛滥,许多人被商品大潮冲昏了头脑,一切向钱看,或纸醉金迷向下堕落,或因失去自我而迷惘,或因不能适应过快的社会变化、过快的生活节奏而心理失调,或因感人情世态之冷漠而悲观失望。道德沦丧、贪污腐化、损公肥私、偷税漏税、诈骗劫盗、制造伪劣产品、贩卖黄色音像、卖淫嫖娼、吸毒贩毒等丑恶现象层出不穷,严重妨碍着两个文明的建设,破坏着社会正常秩序,污染着人心世风,亟需佛教以清凉法雨滋润人心,涤除污垢,消毒化瘀,医治社会弊病,挽正人心世风,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指引人们正确地生活。若不能起到这种作用,便是佛弟子的失职。

然而,当今佛教的现状,与时势人心对佛教的要求相去甚远。由于种种社会原因,佛教积弱不振,未能实现它从古代社会的僵硬模式向适应现代社会的新模式之完全转型。教内人才缺乏,青黄不接,教徒素质偏低,缺乏应机弘法的智慧方便,弘法方式保守落后。一些寺庙,封建因素尚未完全肃清,在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消极被动,信仰淡化,道风不整,终日常忤佛事,忘记了化导众生积极建设人间净土的本分职责。“己不被训,焉能训彼?”(《出曜经》)若连佛教自身的建设都搞不好,岂能谈得上化导众生?岂能尽到引导众生报答国恩、振兴华夏的责任?时势逼人,当急振奋。凡佛弟子,应以高度的责任心、炽热的爱国爱教心,投入佛教建设、国家建设,不要让“四恩齐报”只成一句口头念诵的空言!

本刊 1995 年度荣誉订户

辽宁丹东潘国朴居士	500 元
广东汕头达善法师	500 元
广西玉林吕传振居士	500 元
新加坡孙泽智居士	美金 200 元
江苏睢宁高子玉居士	532 元
广东江门严光法师	500 元
吉林长春王天昌居士	1000 元
河南南阳印光法师	500 元
广东江门青莲庵	526 元
江苏常州谢淑真居士	4150 元
山西太原刘乃英居士	500 元
四川资中智常法师	500 元
广东梅州西区居士林	500 元
广西桂林能仁寺	500 元
江西贵溪孙超居士	600 元
广东塔山旅游区管委会	1000 元
甘肃兰州融开法师	1000 元
宁夏中卫宗相法师	1000 元
江苏南通郑菲居士	500 元
北京能行法师	500 元
浙江义乌陈海花居士	2000 元
浙江宁波七塔寺	3000 元
福建龙海雷韶华居士	500 元
安徽安庆迎江寺	500 元
福建晋江慧济禅寺	500 元
法国潮州会馆心印法师	法郎 500 元
安徽合肥谢长征居士	500 元
浙江瑞安陈锦兴居士	500 元
湖南衡阳圆觉法师	1000 元
广东深圳潘成辉居士	500 元
福建东山汪立聪居士	500 元
北京高魁五居士	500 元
广东潮州正语法师	500 元
云南昆明申秀璠居士	500 元
辽宁辽阳田地居士	500 元
河南偃师李莉萍居士	500 元
福建厦门蔡吉堂居士	500 元
江苏姜堰宏智法师	600 元
安徽潜山了凡法师	500 元
甘肃武都尹文功居士	500 元
四川重庆罗正莲居士	1000 元
香港照暄法师	港币 2000 元
长沙南廓寺佛协	500 元
甘谷李向上居士	500 元
湖北钟祥程德华居士	500 元
普陀山普济寺道生法师	1000 元
北京八里庄卢化民居士	500 元